

# 大学何为

陈平原摇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何为 / 陈平原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

ISBN 7-301-05111-9

I 援大... II 援陈... III 援大学 原研究 IV 援D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 000000 号

书名: 大学何为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著

策划编辑: 赵婕

责任编辑: 周志刚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5111-9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52 号

网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子信箱: [zouyuan@pup.cn](mailto:zouyuan@pup.cn)

电话: 邮购部 010-62750175 发行部 010-62750172 编辑部 010-62750171

排版者: 北京兴盛达打字服务社

印刷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16 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印张 10.5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 62750175 电子邮箱: [zouyuan@pup.cn](mailto:zouyuan@pup.cn)

## 自摇摇序

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,总该有个理由。比如,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,是否有所推进?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,又有哪些特点?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,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。记得小时候过年,最常见的对联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。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,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。

作家查建英采访时,曾追问我在 1992 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:“那场争论当中,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,而社科学者,特别是经济学家们,则是支持的主力。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,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,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‘保守疗法’,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。”<sup>①</sup>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。确实如此,我谈北大改革四文,虽然也入各种集子<sup>②</sup>,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。因为,针对性不强,基本上是自说自话,作为论辩文章读,不过瘾。

为什么?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《独立评论》时所说的,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

---

<sup>①</sup> 参见本书《我的“八十年代”》一文。

<sup>②</sup> 如沈颢主编《燕园变法》,上海文化出版社,1993 年 9 月;博雅主编《北大激进变革》,华夏出版社,1993 年 9 月;钱理群、高远东编《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3 年 9 月;甘阳、李猛编《中国大学改革之道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3 年 9 月。

体上发言,要说负责任的话,既不屈从于权威,也不屈从于舆论。大学改革,别人说好说坏,都可以斩钉截铁,我却深知兹事体大,休想快刀斩乱麻,毕其功于一役。历史证明,那样做,不只不现实,而且效果不好。

相对于论战诸君,我之立论稍微不同,很大原因在于,我对百年中国大学(尤其是北大)有过若干研究。已经刊行的《北大旧事》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《中国大学十讲》等<sup>①</sup>,不敢说有多精彩,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。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,理解改革的代价,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,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。因此,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,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——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,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。

正如德里达说的,“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”,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,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——“抵抗一切(政治、司法、经济等)(对大学)的重占企图,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”<sup>②</sup>,其实是十分艰难的。尤其在当代中国,谈论大学改革,涉及理想与现实、中国与西方、制度与精神、个人与国家等,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。

在《大学三问》中,我特别强调:

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,缺的不是“国际视野”,而是对“传统中国”以及“现代中国”的理解与尊重。

而在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》中,我又认定: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北大旧事》,北京:三联书店,1998年;《老北大的故事》,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8年;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99年;《中国大学十讲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9年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杜小真、张宁主编《德里达中国讲演集》第156页,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1998年。

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,不可能标准化,必须服一方水土,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百年北大,其迷人之处,正在于她不是“办”在中国,而是“长”在中国——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,流血流泪,走弯路,吃苦头,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。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,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,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。如果有一天,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、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,但与当代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进程无关,那绝对不值得庆贺。

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,无法简单复制,故全书以《大学之道》起兴,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。在我看来,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,好戏——或者烂戏——还在后头呢。

“中国经验”,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,是我理解“大学之道”的关键。我当然明白,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,主要是“旁采泰西”而不是“上法三代”的结果。因此,在思考及论述中,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,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。比如,关注“大学的理想”<sup>①</sup>,也探究“大学的功用”<sup>②</sup>;思考“学术责任”<sup>③</sup>;也努力“走出象牙塔”<sup>④</sup>,进入“美国校园文化”<sup>⑤</sup>,也面向“圆世纪的大学”<sup>⑥</sup>。教育学家的著述

① 参见约翰·亨利·纽曼著、徐辉等译《大学的理想》,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5年。

② 参见悦章、刘春、陈学飞等译《大学的功用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5年。

③ 参见唐纳德·肯尼迪著、阎凤桥等译《学术责任》,北京:新华出版社,1995年。

④ 参见德里克·博克著、徐小洲等译《走出象牙塔—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》,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5年。

⑤ 参见亨利·罗索夫斯基著、谢宗仙等译《美国校园文化——学生·教授·管理》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5年。

⑥ 参见詹姆斯·杜德斯达著、刘彤等译《圆世纪的大学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年。

固然精彩,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,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:

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,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,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,是学术勃发的世界。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,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。<sup>①</sup>

为了实现人的潜能,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,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。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,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,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,它保存伟大的行为、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,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。<sup>②</sup>

大学,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,它原则上(当然实际上不完全)是真理、人的本质、人类、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、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,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。<sup>③</sup>

雅斯贝尔斯(运动与竞赛译,页112)、布鲁姆(孤独社月蝶是,页112)和德里达(解释学阅读译,页112),这三位大学者,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,或存在主义,或保守主义,或解构主义,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,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速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,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,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,这是我所感兴趣的。或许,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

① 雅斯贝尔斯著、邹进译《什么是教育》第112页,北京:三联书店,1989年。

② 布鲁姆著、缪青等译《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》第112页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。

③ 杜小真、张宁主编《德里达中国讲演集》第112页,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1998年。

家,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、教育管理、教育经济等,而集中精力在文化、精神、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,这样一来,反而能在“教育名著”视野之外,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。而这也正是我切入“大学”的角度——在我看来,中国的大学改革,需要教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。

谈论中国大学,可以是专业论文,也可以是专题演讲,还可以是随笔、短论、答问等。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,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,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。或长枪,或短棒,或匕首,或弹弓,只要有效,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。我之不薄“演讲”,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“大学”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。书中好些章节,是作者应邀在北大、清华、华师大、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、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。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》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大学精神、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”研讨会(成都)上的专题演讲,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“开坛”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。《大学之道——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》以及《文学史视野中的“大学叙事”》虽是专业论文,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,并获广泛好评。至于在凤凰卫视“世纪大讲堂”上所做的专题演讲“中国大学百年”<sup>①</sup>,因主要观点已见《中国大学十讲》中的同名论文,这次不再收录。

一般说来,“演讲”以及“答问”,远不如“论文”专深,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。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,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,那么,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“对话”姿态(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),未尝不是“讨巧”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、

---

<sup>①</sup> 文稿刊《中国大学教学》2007年 4期。  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一种教育类型、一种论述策略、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，“对话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。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，更希望学习思考，追求真理，参悟人生，那么，永无止境的“叩问”与“对话”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这么说，类似胡适《尝试集 再版自序》所自嘲的“戏台里喝彩”。其实，将论文与随感、演讲与答问、历史与现实、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，造成一种明显的“对话”状态，在我，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歪打正着。本书之“未完善”，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“进行时”——正因为中国大学仍“在路上”，既非十全十美，也不是朽木不可雕，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，去思考，去参与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本书的“学术思路”比“著述文体”更值得重视，那就是：从历史记忆、文化阐释、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，思考“大学”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，是什么、有什么、还能做些什么。

丙戌正月初六，是日阳光普照，最低气温零下  
十度，浓郁的水仙花香中，编定全书并撰序

# 大学之道

## ——传统书院与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

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，“西化”最为彻底的，当推教育——尤其是高等教育。今日中国之大学，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，乃舶来品，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。因而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“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”，古今中外“大学”之巨大差异，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日而语。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：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，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“大学之道”。

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，其“无裨实用”，在晚清，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。时人之“破旧”，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；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，反而无暇细究。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，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。此后，又是长期的沉寂，直到 20 世纪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。<sup>①</sup> 可即便如此，今日中国的大学，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中国史学论文索引》（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1982 年）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 200 余篇，作者有胡适、柳诒徵、盛郎西、谢国桢、陈东原、梁瓯第、班书阁、吴景贤、王兰荫等。此期间出版的专著有周传儒的《书院制度考》（1934 年）、盛郎西的《中国书院制度》（1935 年）和刘伯骥的《广东书院制度沿革》（1935 年）。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院研究著作有：陈元晖等《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》（1981 年）、章柳泉《中国书院史话》（1981 年）、张正藩《中国书院制度考略》（1982 年）、杨慎初等《岳麓书院史略》（1982 年）、李才栋《白鹿洞书院史略》（1982 年）、朱汉民《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》（1985 年）、丁钢《书院与中国文化》（1986 年）、李才栋《江西古代书院研究》（1987 年）、李国钧等《中国书院史》（1987 年）、白新良《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》（1987 年）、陈谷嘉等《中国书院制度研究》（1987 年）。



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,通行全国。其间虽有反复,但秋风日紧,大树飘零已成定局。

科举取士与书院教学,二者既有联系,但更有差别。明清两代,科举制度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,到了晚清世纪末,更成了中国落后挨打的“罪魁祸首”。可以说,取消科举取士制度,起码在学界,已有长期的理论思考与舆论准备。而废除书院的决策,则是匆促作出的,朝野上下,并没有认真讨论过。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,主要是为了应急——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,以便尽快培养出可以“富国强兵”的“有用之才”。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局面: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人,突然间一路小跑,甩掉了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,而且不吭一声。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抱怨的,“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,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度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”<sup>①</sup>。这里的“并无一人”,乃激愤之言。实际上,有过个别的抗争,只不过人单力薄,无济于事。比如,章太炎便对如此“急功近利”的“兴学”,等于怂恿朝廷统揽教育大权、催逼教育全面西化,有相当激烈的批评<sup>②</sup>。

单就口号而言,晚清以降,教育改革的倡导者,几乎没有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。康有为坚持将“上法三代”放在“旁采泰西”之前,张百熙也是先“上溯古制”,后才“参考列邦”<sup>③</sup>。可这些沟通中西的努力,最后都基本上落空。翻阅晚清及民国的各种学制,除了在“宗旨”部分表达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强烈愿望外,制度建设方面几乎只能“旁采泰西”。原因是,上古学制的准确面目,今人难以把握,更谈不上将其道入晚清的学制创新。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

① 舒新城:《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》第 5 页,上海:中华书局,1984 年。

② 参见拙作《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》,《学人》第二辑,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5 年。

③ 参见康有为《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》和张百熙《进呈学堂章程折》,均见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上册。

招,希望以“孔墨教育之精神”,来补充欧美大学体制;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。在止于至善”<sup>①</sup>——可这都是 1919 年代以后的事,其时书院已经逐渐隐入历史深处。

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家宁愿纵论缥缈含糊的“三代之学”,而不想涉及近在眼前的书院之利弊得失,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,比如,不愿意“穿新鞋走老路”,或者担心旧体制因而“藕断丝连”等。可这么一来,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,被高悬云端,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想象力的制度创新。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,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,教育家们方才回过神来,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。比如,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此大发感慨:

书院之废,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。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,将不复现于今日。<sup>②</sup>

大略与此同时,胡适的好友、同样留美归来的陈衡哲、任鸿隽夫妇联名发表《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》,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,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:

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,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。中国书院的组织,是以人为中心的,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,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,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,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,如朱文公的白鹿洞,胡安定的湖州,都是一例。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,现在的时代,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,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,而现在求学的方

<sup>①</sup> 参见蔡元培《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》(《蔡元培全集》第四卷第 128 页,北京:中华书局,1997 年)和梅贻琦《大学一解》(《清华学报》第 1 卷第 1 期,1912 年 1 月)。

<sup>②</sup> 胡适:《书院制史略》,《东方杂志》第 16 卷 1 期,1919 年 1 月。

法,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。要补救这个缺点,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。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,这个书院的先生,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,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,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(生)的求学、品行两方面,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。<sup>①</sup>

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,二者合而为一,这一主张,同上述梅贻琦《大学一解》中的说法,倒是不谋而合。

胡、梅、陈、任诸君,均为留美学生,尚且对即将远去的书院“依依不舍”,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,当更有感触。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激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,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身的唐文治之独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,都与其学术背景大有关联。至于谢国桢、金景芳、钱仲联等之大力表彰书院教学传统,也与其早年追随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、无锡国专密不可分。<sup>②</sup>可所有这些,均只是个人行为,其规模与效果,无法与当初摧枯拉朽的学制创新相比拟。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擅长“以史为鉴”的中国学人,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时,开始“补偏救弊”。于是,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“风景线”。那便是:借书院改造大学,或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。

<sup>①</sup> 陈衡哲、任鸿隽:《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》,《现代评论》第10卷第3期,1921年10月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谢国桢《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》(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3年)、金景芳《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性书院谈起》(《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》第一辑,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2年)和钱仲联《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》(《文教资料》1983年10期)。

## 二、借鉴书院的努力

晚清的教育改革,康梁师徒无疑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。不只因其大力提倡,促成了书院改学堂诏令的颁发,更因其办学实践——广州的万木草堂和湖南的时务学堂,凸显了从传统书院向现代学堂的过渡。

康有为之讲学万木草堂(无~~误~~—~~愿~~),以孔学、佛学、宋明理学为本,以史学、西学为用,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颇多创新之处。弟子梁启超《南海康南海传》第三章“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”的概括不无道理:

中国数千年无学校,至长兴学舍,虽其组织之完备,万不逮泰西之一,而其精神,则未多让之。其见于形式上者,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,亦皆属创举。<sup>①</sup>

万木草堂之“中西合璧”,很可能并非自觉的追求。康氏的理想,乃全力以赴追摹西方,只是囿于主事者的知识结构,方才弄得这般“半中不西”。之所以如此立说,因《大同书》中对“大学院”的设计,传统书院的影子荡然无存。康氏心目中“大同之时”的大学,最关键的几条,如“无一业不设专门,无一人不有专学”、“虽有事于虚文,而必从事于实验”、“农学设于田野,商学设于市肆,工学设于作厂,矿学设于山颠,渔学设于水滨,政学设于官府”、“二十岁学成,给毕业证书而出学,听其就业”等<sup>②</sup>,都与传统书院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驰。

只能说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康氏万木草堂之中西合璧,其新

<sup>①</sup> 梁启超: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《清议报》第~~无~~册,~~无~~年~~无~~月。

<sup>②</sup> 康有为:《大同书》己部第六章,北京:古籍出版社,~~无~~年。

旧体制及精神的诸多缠绕纠葛,值得教育史家认真探究。弟子梁启超的筹办湖南时务学堂(1898—1899),基本上是依样画葫芦。《时务学堂学约》之强调立志、养气、治身、读书、穷理、学文、乐群、摄生、经世、行教<sup>①</sup>,不完全是康师家法,夹杂了一些“湖湘学派”的气味,大概是为了“在变通损益中获得其生存权”<sup>②</sup>。但《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》对读书法及具体科目的设计<sup>③</sup>,则明显来自万木草堂。至于教学效果,则不妨借用杨树达的《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》:

惟我楚士,闻风激扬。乃兴黉舍,言储栋梁。礼延我师,自沪而湘。济济多士,如饥获粮。其诵维何?孟轲公羊。其教维何?革政救亡。士闻大义,心痛国创。拔剑击柱,踊跃如狂。夫子诏我,摄汝光芒。救国在学,乃惟康庄。<sup>④</sup>

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李肖聃撰有《星庐笔记》,称:“万木草堂教法,颇张陆、王而抑程、朱。梁终身守师说不变。”<sup>⑤</sup>我想补充的是,这里所说的“守师说”,不只是论学宗旨,更应该包括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。

1902年后,已经退出政界一心讲学的梁启超,希望在新式学堂中实行自由讲座制。理由是,近世学校教育有两大缺点:第一,“此种‘水平线式’的教育,实国家主义之产物”;第二,“其学业之相授受,若以市道交也”。至于自由讲座制的具体实施,则有如下规划:

① 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》,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二册,上海:中华书局,1933年。

② 参阅杨念群《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》第八章,北京:三联书店,1998年。

③ 《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》,《中西学门径书七种》,上海:大同译书局,1898年。

④ 杨树达:《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》,《积微翁回忆录·积微居诗文钞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。

⑤ 李肖聃:《星庐笔记》第3页,长沙:岳麓书社,1984年。

此种组织,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。使学校  
教师学生三者之间,皆为人的关系,而非物的关系。……  
如此则教育不至为“机械化”,不至为“平庸化”。社会上  
真面目之人才,或可以养成也。<sup>①</sup>

大概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,梁启超慨然出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  
导师,希望“在这新的机关之中,参合着旧的精神”。具体说来,  
便是“一面求智识的推求,一面求道术的修养,两者打成一片”。可  
两年多后,梁氏不得不承认理想落空:上课下课,“多变成整套的机  
械作用”,师生之间,“除了堂上听讲外,绝少接谈的机会”<sup>②</sup>。

紧跟时代步伐的梁启超,其谈论“自由讲座制”,并非一时冲  
动,很可能是基于早年就读万木草堂以及执教时务学堂的经验。  
如果说康梁师徒是从明清书院传统里冲杀出来,其谈论教育,自然  
而然地带有书院的印记。蔡元培、胡适则是在建立现代大学的过程  
中,意识到某种沟通整合东西方教育精神的机遇,方才回过头来,  
重新评价已经失落了的书院。

蔡元培之留学德国与胡适的就读美国,都为其教育生涯打下  
了深深的烙印。归国办教育,蔡、胡均以欧美大学为样板。而对于  
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及精神,跟绝大部分新文化人一样,蔡、胡二  
位其实并不十分看好。<sup>③</sup>只是由于某种特殊因缘,比如“道尔顿制”  
的引进,或创办研究院的需要,书院的身影及魅力,方才被认真关  
注。

① 梁启超:《自由讲座之教育》,《改造》第 7 卷 7 号,1918 年 7 月。

② 参见丁文江等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第 1 卷 11—12 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 年。

③ 1918 年 9 月,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“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”的  
演讲,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,“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”,晚清以降,“摆在我们面前  
的问题,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,建立自己的大学”(《蔡元培全集》第五卷第 7 页)。实际上,  
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,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,信心始终不足,不存在“估  
价过高”的问题。

为了落实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”的办学宗旨，蔡元培出长北大后极力推进研究院的创设。1915年拟设的各门研究所，终因经费缺乏而搁浅。1916年12月18日，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《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》，获得通过；第二年一月，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。“研究所仿德、美两国大学之某某办法，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。”<sup>①</sup>这一表述，与三四年后胡适为清华学校设计研究院的思路，似乎不太一致。可要是考虑到蔡校长1916年郑重其事地向学界推荐《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》，就不难明白其中的联系。《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》第一章“宗旨及定名”称：

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，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，取自动的方法，研究各种学术，以期发明真理，造就人才，使文化普及于平民，学术周流于社会。<sup>②</sup>

蔡先生之所以对此“宗旨”大有好感，皆因感慨于“近二十年来，取法欧美，建设学校，偏重分班授课、限年毕业之制。书院旧制，荡然无存”，故寄希望于“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”<sup>③</sup>。

1916年12月18日，清华校务会议通过《研究院章程》称“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”，故决定“延名师，拓精舍，招海内成学之士”。其“研究方法”九例，第一曰：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：研究之法，注重个人自修，教授专任指导，其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，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，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，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，均能确有收获。”<sup>④</sup>此研究院

<sup>①</sup> 《公布北大 研究所简章 布告》，《蔡元培全集》第三卷第153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
<sup>②</sup> 《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》，《新教育》第12卷11期，1916年12月。

<sup>③</sup> 《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》，《蔡元培全集》第四卷第153页。

<sup>④</sup> 《研究院章程》，《清华周刊》第12期，1916年。